

## 板本研究

## 臺海出版社影印《續修臺灣府志》價值

郭明芳\*

《臺灣府志》為記清領時期臺灣重要志書，凡有六修。<sup>1</sup>此六次集中康雍乾一百年間，亦顯示清初修志風氣之盛。乾隆中期以後，臺灣未再有新志刊梓，<sup>2</sup>一直到日治初期，欲瞭解臺灣者全靠余文儀《續修臺灣府志》(下或簡稱「余《志》」)。<sup>3</sup>同光以降，余《志》續有修補刷印，然或根據序文著錄作乾隆初刊本<sup>4</sup>。

2017年3月北京臺海出版社影印出版余《志》線裝一函十二冊，並稍後有贈送臺灣各大學圖書館之舉<sup>5</sup>。該社影印出版版本為同治八(1869)年修補本，臺灣未見典藏<sup>6</sup>，對研究余《志》的刊行、流傳有其價值。截至目前為止，僅見有陳惠美、謝鶯興所撰〈記余文儀臺灣府志同治八年補刻本--兼談乾隆年間原刻本〉比對討論<sup>7</sup>。而此書價值如何，未見深述。筆者就所知討論此書影印價值。

## 一、完整影印現存最早印本

古籍或有漫漶處，在影印時或有修配、描潤使之清晰。此舉固然便於讀者閱讀，然已失原書影印意義，且若配補本非屬同一版本，或經描潤，則於

---

\*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。

<sup>1</sup> 此六次即康熙蔣毓英、高拱乾、周元文三種，乾隆劉良璧、范咸與余文儀三種。另清領之初，有陳挺章《臺灣府志》，收於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實為明鄭修臺志之遺，較少為人知。

<sup>2</sup> 光緒臺灣建省，曾開局纂修《通志》，惜因甲午割臺，稿本流落廈門，未能刊行。其稿本後幾為臺灣總督府收購，今存國立臺灣圖書館，早年《臺灣文獻叢刊》曾據以點校出版。此外，少為人知，又有稿本六冊存上海圖書館，引見陳光貽《稀見地方志提要》(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7年8月)，頁709-710。

<sup>3</sup> 日治初期，臺灣總督府曾於臺南孔廟得余《志》版片，運抵臺北後，重加修整並刷印，惜後來書版毀於火。今僅存書版兩片藏國立臺灣博物館。

<sup>4</sup>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曾將所藏影印連載於《高雄文獻》即稱乾隆原刻本，然核對卷端書影漫漶程度，非初刊可確定。事實上此本，筆者認為是光緒十六年修補本。又國立臺灣圖書館或故宮博物院所藏皆著錄原刻本，亦應如是觀。

<sup>5</sup> 見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公告，網址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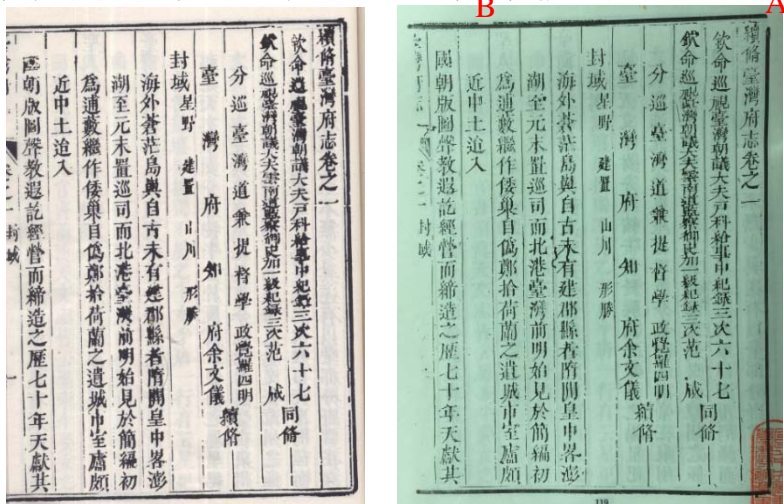
<http://www.lac.org.tw/eventbulletin/20170607-8788-1041605142>

<sup>6</sup> 此本亦未見註明影印自何館藏，經查藏有該版者，有中國國家圖書館、北京大學書館(兩部)、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與復旦大學圖書館等館藏。筆者懷疑此本據中國國圖所藏影印。

<sup>7</sup> 見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》第23期，頁43-53，2017年11月。

日後作版本比對則一無用處。因此，古籍影印不因漫漶而作配補、描潤，而應儘量依原書影印，以反映原書狀況。

余《志》早年有成文出版社《中國方志叢書》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(即今日國立臺灣圖書館)藏本影印，以及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據所藏本影印，連載《高雄文獻》。此二種皆稱「乾隆卅九(1774)年原刊本」。事實上，成文版有描潤與配補，《高雄文獻》本則為光緒十六(1890)年修補本。若吾人根據上述二書比對，則結果應有所偏差。而今日所見余《志》不少，從卷端版框漫漶程度看應非原刊本可知<sup>8</sup>。以成文社影本比對臺海社本卷端，成文社版框已經描潤，惟於下圖 A、B 兩處已見斷版，且此書版匡雙欄，成文本版框內欄線已模糊不清，自然不可能早於臺海社本。再據《高雄文獻》所載或實際實物看，臺海社影印本可說是目前所見余《志》最早修補印本。<sup>9</sup>



臺海社影印本卷一卷端

《中國方志叢書》本卷一卷端

## 二、瞭解余《志》之刊梓與流傳

余《志》為增補范《志》，內容與范《志》高度重疊，揆諸其編纂主旨，

<sup>8</sup> 臺海本卷一卷端右上無缺損，若有有缺損者刊印時間應較晚。故以此本為基，凡無缺損者當在此之前，反之則在此之後。

<sup>9</sup> 關於余《志》版本，筆者調查與目驗不少版本，依時間排列計有：同治八(1869)年王興源修補本(即本書)、同治十一(1872)年黃泉記修補本、光緒十四(1888)年李鴻銘修補本、光緒十六(1890)年□錫熙修補本與明治年間臺灣總督府修補本。另外尚有二種版本，筆者持保留態度，一是據《臺遊日記》所錄有光緒四(1878)年刊本，此或為光緒十四(1888)年之誤；又有光緒廿(1894)年修補本之說，應不可能，蓋時臺灣已在改隸之際，兵荒馬亂，不可能對此書有所修補，是否有可能得書時間，誤為刊印時間？

乃為資治需要，增補新資料。余〈序〉：「是書率因循而未付梓，…」余文儀官閩撫時，欲整理自己著述以名流千古，他在乾隆甲午先整理詩集刊行，即《嘉樹樓詩鈔》四卷。今華東師大藏一部《嘉樹樓詩鈔》，扉葉作「乾隆甲午歲鐫」。此與余請〈府志序〉於鐘音時間相近。待《嘉樹堂詩鈔》刊印後，始再刊《府志》。余〈序〉：「退食從容，手此一編，以溯回竹城、赤嵌間也。爰是附加校閱，授剞劂氏而誌其顛末。」

《臺灣府志》纂修至余《志》後即告中斷<sup>10</sup>，一直要到建省後方有《通志》之纂。乾隆中期以後至光緒年間，官府只能靠余《志》了解臺灣。而於民間亦只能藉由傳抄以獲得臺灣相關資訊。其後余《志》刷印或修補均委之松雲軒，並始有販售。今日所存之余《志》絕大部分應後修補本，原刻極為少見。此本為今日所見最早修補本，更有可能是現存最早刊本，迄今未為人所知。

在此本之前，此書至少應有一次補刻，例如說卷二葉六與葉七明顯不同：葉七頁面較葉六清晰，字體偏大，有可能是補刊。又卷二葉卅五、卷廿三葉八至九等版面亦有異他版。又卷五末作「續修臺灣府志卷五終」與同卷卷端作「續修臺灣府志卷之五終」不同，又卷廿六葉二左文字亦異等。

卷九葉十四、十五有「寧」、「萬曆」，皆如原字，未避諱<sup>11</sup>。其字體亦與他葉不同，亦應後刻，時間應在道光、咸豐以後。時清朝國力中衰，避諱要求逐漸廢弛。



臺海社影印本卷廿三葉九

<sup>10</sup>有學者認為道光時曾有修纂《府志》，但未見刊行傳世。筆者認為道光時所纂修《府志》或無其書，但其內容是否保存於新纂修之《福建通志》，仍有待探究。蓋蔣《府志》亦未刊行，但其為修《通志》所作準備亦反映於康熙《福建通志》。今日所傳蔣《志》乃是蔣氏後人將書稿帶回大陸所刊刻。

<sup>11</sup>乾隆時文網甚嚴，對清帝名諱不作避諱，很難想像這是乾隆時原刊之遺。

### 三、松雲軒代官府修版新探

此書之刊在余文儀任閩撫之時。蓋時余文儀整理其著作刊梓，《府志》亦在此時整理成書並刊梓。刊梓後，版歸臺灣府學，府學欲刷印或修補則委之書肆松雲軒。松雲軒為清末至日治初期臺灣府城重要書肆，刊印不少書籍。歷來研究松雲軒刻書以楊永智在《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》最為完整。其後，楊氏續考察松雲軒刻書共有六十八種<sup>12</sup>。而這六十八種僅見《全臺輿圖》屬於官書，其餘或屬民間善書或代官員、文人所刊書籍。楊著中未談及松雲軒與官府之間合作關係。臺海本〈臺灣八景圖〉中「澄臺觀海」版心下緣見有「松雲軒刊」字，正可對松雲軒與官府合作關係作一補充。

按，在刊印不發達地區，官府欲刻書多委之該地方書肆。臺南松雲軒亦承擔著修補與刷印官府書籍的責任。至於松雲軒是否有代刊官府書籍，筆者則持否定態度。楊永智謂《全臺輿圖》為松雲軒所刊。筆者認為此書為松雲軒修補、刷印，並非該肆所刊。《全臺輿圖》為夏獻綸(?-1879)纂，版藏臺灣道署，一般多作臺灣道府刊本。事實上，此書監刻者余寵，尚有監刻另一種臺灣地圖，為廣東富文齋所刊。此本亦應如是觀。其最大關鍵在於此本卷末周懋琦跋文字異於全書。蓋此書刻成並運回臺之時，夏獻綸過世，新上任的知府周懋琦補撰跋文，委之當地松雲軒補刻。

臺海本扉葉稱王興源添刻者，其字體均作楷體，凡十片書版<sup>13</sup>，亦與扉葉「失落數片」之說相接近。王興源原為福建刻工，後渡海來台執業，應委身於松雲軒，專事刻書，刊有《六亭文集》等書。

### 四、對余《志》犯禁刑改說質疑

雖然余《志》有經修補，但相較於光緒以後的本子，臺海社本仍保有原刻本樣貌。此本既為現存較早印本余《志》，則對前人謂余《志》不少空白葉面為犯禁刑改說提出新說法。高志彬在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乾隆刊本的〈續修臺灣府志編印說明〉說：「本《志》原刻本刊行後，據云有七項涉及干犯，致使原刻本流傳甚少。」(頁 2)高氏或徵引前人之說，未談及理由<sup>14</sup>。

<sup>12</sup>楊氏《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》原作五十九種，此增為六十八種，詳氏撰〈婆娑洋裏書猶存：自松雲軒藏版羅漢解起講〉一文。此篇未見出版，見於 2017 年 9 月臺北大行拍賣行臺灣關係拍賣會貼文。

<sup>13</sup>計有卷二葉廿五、卷三葉廿三至廿四、卷六葉廿二、卷七葉五至六與廿、卷十一葉十四、卷廿四葉卅四至卅五(此與同卷葉卅二至卅三重複)。

<sup>14</sup>筆者認為造成這樣誤解，應該誤解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廿四日于敏中寄各省上諭有

其後黃美娥在〈續修臺灣府志點校前言〉則進一步指出：

而關於此三十九年「序刊本」之內容，約有二十處挖空缺字情形，少則數字，多則整頁，以之比對所承襲之范《志》，大抵刪削者多屬明朝年號、職官、史事之相關言論或作品，乃至臺變起事者的正面敘述。…雖然稿成於天下昇平之際，但余氏卻是「復加校閱」，才「授剖劇氏」，**是否起因於乾隆中後期為清代文字獄之最高峰，余氏在刊印地方志時不免有所顧忌，是以在刻版完成後，猶恐部份文字事涉干犯而進行了處理。**然則此一現象，或也連帶導致了高志彬所謂「據云有七項涉及干犯，致使原刻本流傳甚少」的結果。(頁 15-16)

這裡所稱「序刊本」並非真是乾隆原刊本，此其一。余《志》中見有明朝年號亦有未刪削，明朝年號並非犯禁。再余《志》中出現空白葉面也與明代或民變正面敘述無關，此其二。由於余《志》乃屬范《志》增修，故而文建會點校本據范《志》補缺余《志》文句。同是乾隆時刊印的范《志》可出現，卻在稍晚的余《志》為禁，頗不可思議，此其三。

又所見空白葉面多屬詩文，與犯禁更無關，如卷廿八〈藝文〉七詩四，首齊體物〈北園別館〉、次高拱乾〈臺灣雜詠〉二首，其後空四行、下葉空十行，始接孫元衡〈野宿〉：「秋雲向暮總陰森」。此間有空十四行空間。檢范《志》〈野宿〉前有高拱乾〈鹿耳門春潮〉、〈漁火〉，王兆陞〈郊行即事〉二首與孫元衡〈抵臺灣〉與〈海市清言〉二首。以上諸首若加入則未見扞格，內容亦無任何犯諱可言。此其四。

造成余《志》有空白葉面與其說是犯禁刪改，不如說當時已缺留白。此書纂修之初，或范《志》已有缺文，至刊行已歷多年，再或原稿有失而無法補足。故而留白以待後人增補。

臺海社影印余《志》對研究臺灣出版史與地方志纂修極具價值，再加上此本為臺灣未見典藏，價值更不言可喻。前人研究成果中，或可藉此本補足或修訂論點亦不少，今日古籍影印有功於研究正是如此--使稀少古書化身千千萬，便於典藏，也便於學術研究推展。

---

關。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(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7月)「寄諭各省督撫將志乘所載應禁詩文及著者事實書目概行刪節」(頁 1129)所言僅舉錢謙益、屈大均與金堡三人，並未指三人以外著述。